

传入朝鲜的清代禁毁书籍

杨 雨 蕾

康乾时期被认为是清代经济文化的繁盛期,尤其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之际,文化活动达到高潮。然而与此相伴的,却是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朝廷在徵集、编纂图书的同时,查缴、销毁了大批被认为有违纲常伦理、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皇朝统治地位的书籍,同时制造了多起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所谓“违碍”、“悖逆”的书籍却在那时传入朝鲜半岛,并被保存下来。本文考察传入朝鲜的清代禁毁书(不包括禁毁小说)^①的情况,利用清代朝鲜使臣的入华行纪——“燕行录”资料探求它们传入朝鲜的背景、途径,并联系清初期中韩关系作一评说。

一

传入朝鲜的清代禁毁书到底有多少?现已无法确知。笔者根据朝鲜正祖五年(1781)徐浩修奉命编撰的《奎章总目》和部分燕行录数据,仔细对照清代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和近人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②,得知收入《奎章总目》的清代各类禁毁书有一百十三种,另:燕行录记载有三种。

这些书籍从内容上看,经部三种(包括四书类二种、小学类一种,为吕留良和顾炎武的作品);史部二十四种(包括正史类三种、别史类十八种、掌故类一种、地理类二种);子部十七种(包括儒家类二种、兵家类六种、释家类一种、说家类二种、类事类五种、丛书类一种);集部七十二种(包括总集类十九种、别

①韩国高丽大学崔容澈教授的研究论文《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载《东方丛刊》,1998年第3期)对此有初步研究。

②商务印书馆,1957年。

集类五十三种)^①。可见集部占多数,这自然是因为清代禁毁书中集部书籍最多。

从时代上看,明人著作占多数,共八十五种,超过73%,大多有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内容。清时期著作(含明末清初的著作)共三十一一种,其中多为文字狱下的禁毁书^②。

将上面这些传入朝鲜半岛的禁毁书对照1972年编制的《奎章阁中国本总目录》,可知其中的七十七种还保存在现属汉城大学的奎章阁里。在这七十七种禁毁书中,《宋元通鉴》国内已收入《通鉴大全》之中;《音学五书》、《东林列传》、《日知录》、《图书编》、《宋诗钞》、《明诗综》、《马端肃公奏议》、《袁中郎集》、《高子遗书》和《曝书亭集》等十种经“抽毁”后仍收入《四库全书》;近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有三十五种;从《中国丛书综录》中能找到《三藩纪事本末》、《说铃》、《尺牍新钞结邻集》、《锺伯敬集》、《谭友夏集》和《澹园集》等六种。此外,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能见到四十七种,四十七种中除去上述《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和《中国丛书综录》已收有的三十四种,多收入十三种。在剩下的十二种中,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和《续修四库全书》有七种:《谷山笔麈》、《戎事类占》、《徐文长集》、《苍耳斋近

①其中经部四书类有《晚村讲义》、《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小学类有《音学五书》;史部正史类有《宋元通鉴》、《吾学编》、《昭代典则》,别史类有《名山藏》、《藏书》、《续藏书》、《函史》、《明政统宗》、《弇州史料》、《孤树哀谈》、《谷山笔麈》、《读史漫录》、《三朝要典》、《颂天胪笔》、《两浙名贤录》、《皇明名臣言行录》、《启祯野乘》、《明季遗闻》、《三藩纪事本末》、《东林列传》、《留溪外传》,掌故类有《国朝典汇》,地理类有《广舆记》、《经世挈要》;子部儒家类有《性理大全》、《日知录》,兵家类有《登坛必究》、《督戎疏纪》、《戎事类占》、《金汤(借箸)十二筹》、《广百将传》、《武备志》,释家类有《楞严蒙钞》,说家类有《鸿苞集》、《说铃》,类事类有《图书编》、《鸿书》、《皇明经济文辑》、《皇明名臣经济录》、《八编类纂》,丛书类有《眉公秘籍》;集部总集类有《古文奇赏》、《古文觉斯》、《嘉定四先生全集》、《皇明两朝疏抄》、《皇明奏疏》、《不愧堂奏疏》、《四六全书》、《古诗归》、《唐诗归》、《石仓历代诗选》、《明文英华》、《留青全集》、《尺牍新钞结邻集》、《宋诗钞》、《历代诗家》、《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百名家诗选》;别集类有《顾亭林集》、《感旧集》、《马端肃公奏议》、《何文肃公集》、《张太岳集》、《赐间堂集》、《许文穆公集》、《玉恩堂集》、《归震川集》、《大泌山房集》、《徐文长集》、《冯宗伯集》、《苍耳斋近稿》、《万一楼集》、《李文节集》、《睡庵集》、《即三集》、《苍霞草》、《松石斋集》、《黄离草》、《李氏焚书》、《虞德园集》、《袁中郎集》、《珂雪斋集》、《七录斋集》、《锺伯敬集》、《谭友夏集》、《谭子诗归》、《澹园集》、《容台集》、《歇庵集》、《猴山集》、《宝日堂集》、《文太清集》、《萤芝集》、《高子遗书》、《杨忠烈集》、《左忠毅公集》、《眉公集》、《眉公十种藏书》、《孙高阳集》、《止止堂集》、《几亭全书》、《陶庵集》、《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赖古堂集》、《曝书亭集》、《三魏全集》、《杜悔堂文集》、《西坡类稿》、《笠翁一家言》。

②清代忌讳情况可参看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

稿》^①、《歇庵集》、《猴山集》和《眉公集》。另：《鸿苞集》有宁波天一阁藏本；《不愧堂奏疏》^②、《归震川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本；《皇明奏疏》浙江图书馆有藏本^③。现只留下《西坡类稿》笔者还未查到国内有收藏。尽管现今韩国奎章阁所藏禁毁书几乎并无多少为孤本，但是同种书的中国藏本和韩国藏本值得作一比照。相关研究笔者拟另作专文讨论。

上述统计或能管窥清代禁毁书籍传入朝鲜的情况。我们知道，建于正祖元年（1776）的奎章阁是朝鲜王朝的王家图书馆，最初主要奉安历代大王的御制、御笔和御谱等，不过不久就将弘文馆原有藏书移至该馆，并同时在国内外广为收集图书以充实馆藏。《奎章总目》收录当时藏于馆内的中国本图书共712种、13642册。从奎章阁始建的1776年到1781年编撰《奎章总目》的六年，正值清编纂《四库全书》（1773-1782）并大规模禁书之时（1774-1793），虽然这期间的馆藏禁毁书可能部分在清禁书前已传入，但是令人关注的是，奉行“事大”政策的王朝政府在清大规模禁书之时却将不少这类“违碍”、“悖逆”书籍收藏于王家图书馆内，且数量竟超过当时藏书种数的七分之一。

二

朝鲜王朝治下的社会是一个极其封闭的社会，被王朝政府派遣入中国京城的燕行使臣是它与国外接触的主要管道。燕行使臣除作为媒介传入中国政府赐赠的书籍外，还在王朝政府的鼓励下积极求购书籍，并将它们传入朝鲜。事实上，清代大量汉籍主要是通过燕行使臣传入半岛的，其中就包括当时为清王朝所禁毁的书籍^④。

分析起来，清代禁毁书籍的最大特点就是与文字狱紧密相连并利用徵集图书大规模地展开。在这一点上，朝鲜燕行人士所留下的笔墨道出了中国汉族文人没有或不敢做出的评说。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中感叹“购书之祸甚于焚书”^⑤。而朴思浩在1828年燕行观书肆后更评论康熙开文渊阁道：

康熙时，天下初定，人心未服，海内豪杰之士搢腕而谈愤，开口而咏叹，无非尊攘之义也。海可蹈也，山可隐也，薙发左衽，投帽而抵地曰：甚么物也。于是乎康熙大忧之，开文渊阁，集天下文学之士，縻以美銜，厚其饬养，哀聚书籍，尽夜考校。向所谓豪杰之士，埋头蠹鱼之间，不知老之将至，

①四库全书存目收录本题为《苍耳斋诗稿》。

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题为《不愧堂刻奏疏》。

③浙江图书馆藏本题为《皇明奏疏类抄》。

④参见杨雨蕾：《燕行使臣与汉籍东传朝鲜》，载《韩国研究》第六辑，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5-49页。

⑤（朝）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1997年，第219页。（按，本文“朝”均指朝鲜时代。）

而愤叹之心,如雪遇阳。此乃赚得英雄之术,非但出于右文之意也。^①
这些观察和剖析都可谓深有见地。

当时清廷所禁毁之书大约主要有三类。一是明代史料,尤其是野史,包括一些关于辽金元和涉及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史书,因为这类书籍记录了后金兴起、满人入关的史实,有碍于清政府的体面。二是怀念明朝,以“夷狄”、“胡”、“贼”等诋毁清朝(包括贬金为夷)的著作。三是文字狱下的各类禁毁书,如顾亭林、屈大均、钱谦益等人的著作,或收有这些人作品的书籍。另外还有一些有悖封建伦理纲常、非“正声”的著作^②。其中前三类书籍无疑会引起内心依旧奉明为正统的朝鲜燕行使臣的兴趣。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前一直事明为大的朝鲜王朝虽迫于武力臣服于清,但却对明王朝满是怀念和同情。朝鲜仁祖王第三子、麟坪大君李潸(字用涵,号松溪,1622-1658),曾在1643年与昭显世子一同作为朝鲜王朝质子随清顺治帝入关,期间所留下的燕行诗充满悲凉之情^③。1656年他奉命以陈奏正使身份再次入燕,出发前写道:“今当衔命之行,惨遭丧明之恟”^④,颇为感伤。途中其《玉溜石榻独坐无聊答行台郑圣瑞所赠》诗云:“舐犊那堪惨痛哉,古人犹有丧明哀。封箱谁慰私情切,启旆都缘使事催。野外昏阴鸦已返,客中时序雁初来。重临翠壁诗还就,万斛愁怀为一开。”^⑤更是抒发他视明亡如丧父母的悲恸情怀。

闵镇远(字圣猷,号丹岩,1664-1736),朝鲜肃宗三十八年(1712,清康熙五十一年)作为谢恩副使入京,并写下《燕行录》。《燕行录》中,作者不以清为正统,称满人为胡人,甚至以“胡皇”称康熙,处处以清为夷,对明怀念。看他在途中写下的这一段:

自小黑山五里许始有墩瓮。周围三十步许,高十丈许。以甃坚筑,四面无门,非云梯难上。每五里置一墩,棋布星罗,是明末为御胡筑此瞭望贼兵,而每一墩费千金。胡骑未遏而民先竭,以致贼已去。可为痛哭!^⑥

这种睹物思明,且大发感慨的内容在其燕行录中还有不少。

再看朴趾源《热河日记》之《行在杂录》的一段纪录:

呜呼!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锡赉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事;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札,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何也?上国也。何谓上国?曰:中华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

①(朝)朴思浩:《燕行杂著》,《燕行录选集》上册,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62年,第899页。

②参见王彬:《清代禁书总述》。

③参见(朝)李潸:《松溪集》卷二,《燕行录选集》下册,第139-167页。

④(朝)李潸:《松溪集》疏答,《燕行录选集》下册,第186页。

⑤同④,第181页。

⑥(朝)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第330页。

命也。故其所都燕京曰京师,其巡幸之所曰行在,我效土物之仪曰职贡,其语当宁曰天子,其朝廷曰天朝,陪臣之在庭曰朝天,行人之出我疆场曰天使。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今清按明之久,臣一四海,所以加惠我国者亦累叶矣。…此实旷世盛典而固所来得于皇明之世叶,然而我以惠而不以恩、以忧而不以荣者,何也?非上国也。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①

这段纪录最为概括反映了朝鲜士人对明清两朝的态度。从“上国”到“非上国”,从“朝天”到“燕行”,从“以恩”到“以惠”,他们对清朝怀着难以言表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根植于他们将明朝视作父母的情感,根植于他们对明朝在文化上的崇敬。正是这种态度,一些燕行使臣得以透视清政府编纂《四库全书》的真正用意,亦得以将清政府兴起大规模文字狱归因于文化上的自卑。于是关注文字狱便成为他们寻求共鸣以释放这种情感的方式。

李埏(1737-1795),乾隆四十二年(1777)作为朝贡使团副使入京,他写下的《燕行纪事》中有对“查嗣庭之狱”、“曾静、吕留良案”的详细记载。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进士,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为江西考官,试题“维民所止”。有人告发说“维止”二字乃取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大怒,革职拿问。又在其寓所搜出日记,有直论时事之文,结果因背叛罪而被判处斩。李埏不仅对此案的情况作了说明^②,还评到:

查嗣庭亦历事两朝,为其宰相,而或作词章,无非诋辱清人之辞,则其不服可知。其立朝者尚如此,其不仕者尤当何如耶?^③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清初评点时文大家,明夷夏之变。死后四十年,因曾静欲反清复明一事案发而与其子吕葆中照大逆治罪,戮尸枭市,牵连者众多。此案可谓清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④。李埏对此案的记载甚为详细,笔端对吕留良颇为敬仰,他写道:

吕留良者,江南大儒,即明末清初人也。…留良少时,尝为贡生,旋即敛迹讲学,康熙征辟皆不就,学者称以晚村先生。其经书讲义盛行于天下,我东亦多见者。其所秉执之论,一以春秋大义为主。其言曰:即今有世界而无世界,有君臣而无君臣。夷夏之分当严,君臣之义反轻。又曰:孔子少管仲之器而大其功,至曰:“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此其指一匡九合而言,盖以其伐楚问罪,又尊周攘夷之功故也。以此等义理倡

①(朝)朴趾源:《热河日记》,第187-188页。

②(朝)李埏:《燕行纪事》,《燕行录选集》下卷,第669页。

③同②,第666页。

④《康雍乾间文字之狱》(清代野史丛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名于天下,于是南方之士多诵其说,而服其义。^①

事实上,吕留良作为明代遗民,他的言论、事迹为不少燕行的朝鲜使臣所关注。燕行时间早李埰十二年的洪大容^②,燕行期间便到处打听吕晚村其人和《吕晚村文集》的下落,希望能有幸见到并购得^③。

李埰的有关记述虽然也有错误之处,如将“查嗣庭之狱”和“曾静、吕留良案”发生的时间先后颠倒,但总体看来,如上所述,这些记载还是较为真实的。此类记载在国内同时期史料中并不多得,而且它还能让我们看到燕行使臣对文字狱的态度,弥足珍贵。

燕行使臣对文字狱的关注使他们对文字狱下禁毁书特别注意也就十分自然。于是,只要有机会,他们便煞费苦心,积极访求。1780年朴趾源留住热河时特别与举人王民皞(号鹄汀)谈到禁书:

余(朴趾源)曰:“禁书何若是夥耶?总是崔浩谤史否?”鹄汀曰:“皆迂儒曲学。”余问禁书题目,鹄汀书亭林、西河、牧斋等集数十种,随即裂之。余曰:“永乐时,搜访天下群书为《永乐大典》等书,赚人头白无暇闲笔。今《集成》等书,并是此意否?”鹄汀忙手涂抹曰:“本朝右文,度越百王,不入《四库》,顾为无用。”^④

由此可见朝鲜使臣对禁毁书的关注以及文字狱重压下清朝文人敢怒不敢言的心境。朴趾源此行在太学留馆时与鹄汀、通奉大夫尹嘉铨(号亨山)和贵州按察使奇丰额(号丽川)等笔谈,还曾冒然请求临《明诗综》本考证其中对他五世祖朴仲渊所作的小传。此时,“奇公顾王举人有所酬酢,尹公亦相与语颇久,王举人即书‘明诗综’三字,呼曰:‘来也!’有一少年前拱手,王举人给其题目,其少年疾走去,似去借他处也。…”^⑤。而徐浩修(1736-1799)1790年燕行时与礼部右侍郎铁保(号冶亭)相交,更是曾直接问铁侍郎道:“《牧斋集》方为禁书,阁下何从得见?”冶亭曰:“凡禁书之法,至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尽去。牧斋大质已亏,人固无足观,而诗文则必不泯于后也。”^⑥另外,上述洪大容积极求购《吕晚村文集》也是其中的一例。

燕行使臣获取有关禁毁书籍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到北京琉璃厂书肆求购;二是在与清朝文人交往过程中获赠。

我们知道,北京琉璃厂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文化街市,其书肆规模颇大,尤其在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前后,琉璃厂书肆最盛。当时虽然处于

①(朝)李埰:《燕行记事》,《燕行录选集》下卷,第669页。

②乾隆三十年(1765)以随员身份随冬至使团燕行。

③(朝)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卷,第237、373页。

④(朝)朴趾源:《热河日记》,第226-227页。

⑤同④,第127页。

⑥(朝)徐浩修:《燕行纪》,《燕行录选集》上卷,第467页。

清政府大规模禁书之时,但还有不少这类书在琉璃厂书肆等处流传并出售。燕行使臣便常乘去琉璃厂之际访求这些书籍。李德懋(又名懋官,号炯庵,1741-1793),1778年和朴齐家(字在先,1750-?)作为随员一起燕行入京,在京期间两人经常去琉璃厂访书、购书。就是在琉璃厂书肆中,他们抄录到《古文奇赏》、《说铃》、《音学五书》、《昭代典则》、《弇州别集》等禁毁书^①。此次燕行的书状官也在五柳居购得《顾亭林集》。在归途中他对李德懋说:“左右尝盛言顾亭林炎武之耿介,为明末之第一人物。购其集于五柳居陶生,陶生以为当今之禁书三百余种,《亭林集》居其一。”^②于是李德懋“托其秘藏归来”,阅后慨叹顾亭林“不惟节义卓然,足以横决古今”,“果然明末遗民之第一人”,并称“其诗文典则雅正,不作无心语”。他说:“亭林迹虽布衣,不忘本朝,不赴康熙己未博学弘词科。此真大臣也。其所著《日知录》,可以羽经翼史,可见其淹博也。”^③

燕行使臣对禁毁书,尤其是对文字狱下禁毁书的这种态度,使他们与清代汉族文人的交往十分独特。毋庸讳言,清代汉族文人在异族统治下对昔日明朝持有深深的怀念。然而这种怀念之情由于为清政府所禁忌,在中国当时几乎不见诸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却在燕行使臣的笔下生动展现出来。《热河日记》就记载朴趾源与尹亨山、王鹄汀笔谈时曾就亨山“痴欲煎胶粘日月”一句写下“不须人间费膏烛,双悬日月照乾坤”,当时鹄汀摇手,又墨抹“双悬日月”。为何如此?“盖日月双书则为‘明’字”^④。另外《热河日记》还记载朴趾源与志亭谈及活佛,问:“活佛前身事,比如槐叶青虫截入蜜房为蜂子,……莫不变化,具有觉性。据此化身,能知前形否?若蘧(庄)周栩栩,梦醒各异,不相关属,则无关轮转。若其洞知,果如活佛宿世,此身为某地某氏子,今生此身复为某所某姓儿,宿世父母,今身爷娘,如今无恙,俱大慈悲,历历认识,各各号唤,将谁怨恩?哀乐何居?”见此,“志亭忽泻泪数行,加圈‘哀乐何居’字。”此时,“忽有引户声,志亭急擦纸在握中。”再如上面李埤也列举了不少汉人怀念明朝的例子^⑤,并叹曰:“以此

①(朝)李德懋:《入燕记》,《青庄馆全书》,韩国松树出版社,1997年,第十一册,第94-95页。

②③同①,第106页。

④(朝)朴趾源:《热河日记》,第242页。

⑤“沈昆铜诗曰:那知雁塞龙堆妇,翻补旗裘御榻傍。又曰:剩得鼓吹鸣聒耳,哇声又有奔新年。黄浦庵诗曰:闻道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沈在宽诗则曰:更无地着避秦人。又云: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又有杨大郁者,丧中遭甲申变,其后,因以孝帽终身,人称杨孝帽;徐孝先者,亦于甲申后常戴孝巾,自言为先皇帝戴孝;沈伦则不去发,仍以白衣冠,至死不改。或有节义旌门,不请于朝者,或只称康熙、雍正而不称皇上者,或有遭丧而不立铭旌者。康熙为修明史,招聘山林讲学之士,使之共与编辑,而江南士子亦多不肯就云。”(朝)李埤:《燕行记事》,《燕行录选集》下卷,第666页。

揆之,岂士论尚未尽死耶?”^①

汉族文人对明朝的怀念之情还可以从他们得知朝鲜使臣所穿衣服仍为明朝旧制后的态度显现出来。洪大容燕行期间常被问起所著衣服是遵何代之制^②,当他以“皆遵明制”作答时,对方的表示往往是“垂手默然”^③。又,这种心境从他们谈论朝鲜清阴先生和三学士事迹所表现的感情也能反映出来。清阴先生,朝鲜安东人,本名金尚宪,清阴为其号,有东方大儒之称。宣祖庚寅进士,仁祖朝大提学、为礼曹判书。丙子年(1636),当他得知王廷与清签订和议,便手裂国书痛哭。后入太白山不返。清以其斥和拘留沈阳三年,终不屈而还。后有《清阴先生文集》传世^④。三学士指朝鲜王朝台谏洪翼汉、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崇德二年三月甲辰,三人因曾陈疏反对王廷与清签订和议,被朝鲜太宗谕令解送沈阳,三人宁死不屈,最后被清诛于市。《皇清开国方略》对此事有记载^⑤。当洪大容将清阴三学士事写在纸上后,“诸人看毕,皆愀然无语”,潘廷筠(字兰公、香祖,号德园)更“以三学士姓名藏于篋中”^⑥。可谓无奈。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双方的交往颇能心灵相契,理解至深,于是一些禁毁书也在此过程中被私下赠送抄录而传入朝鲜。与洪大容在琉璃厂邂逅之后结下“性命之交”的严诚,就将《感旧集》全帙赠给洪氏。

三

韩国学者全海宗把清朝中韩关系称为典型的朝贡关系,它主要反映在政治层面,而非文化层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关系还掩盖了双方的文化关系。但另一方面,在清朝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家义理观和对壬辰倭乱中明军救助的感激使朝鲜在文化上仍以明为正统。他们强调儒家社会的华夷思想,自称为“小中华”,在内心深处视清为夷,不少为清所禁的明人著作和一些文字狱下的禁毁书不断传入并被保存在王廷图书馆的事实正说明了这点。视清为夷,却又“力屈而服”,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强烈矛盾,这是清初期朝鲜王朝对清关系的显著特点。

禁毁书传入朝鲜在哪些方面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半岛造成影响,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从一个角度看,禁毁书中大量讥贬满族先世的内容在引发朝鲜学人对明怀念的同时,也触动了他们自以为“小中华”的自豪感。尤其是那些文字狱下的禁毁书中反映汉族文人坚贞民族气节和强烈民族感情的内容激

①(朝)李埤:《燕行记事》,《燕行录选集》下卷,第666页。

②(朝)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卷,第235,238,375页。

③(朝)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卷,第388页。

④参见(朝)安鍾和:《国朝人物志》卷三,韩国明文堂,1983年影印版,第16页。

⑤参见(朝)徐浩修:《燕行纪》,《燕行录选集》上卷,第514页。

⑥(朝)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卷,第420页。

起了朝鲜学人的共鸣。这种共鸣使他们的民族自觉在其“小中华”意识下不仅没有被压抑,反而得到了唤醒。可叹的是,又正是这种意识,朝鲜王朝一个时期内文化上继续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了他们对新思想的吸收。然而不管他们对明有多深的怀念,都无法改变明朝已亡的现实。之后随着清朝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北学思想、西学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出现,朝鲜王朝对清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方面的矛盾逐渐趋于缓解,中韩文化交流也逐渐摆脱明朝的残影。

纵观十七、十八世纪后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朝鲜当时对文化都采取了极为专制、保守的态度,但是究其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的。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继承了明末专制的君主统治,另一方面出于对人口众多又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心存惧虑,在文化上采取了极为专制的手段,大兴“文字狱”,大量禁毁有关书籍。而处于朝鲜王朝时代的朝鲜半岛国家在政治上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则出于对明朝的怀念,极力固守因循守旧的儒家思想,强调所谓的夷狄观,拒绝接受异质的文化、思想。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何种原因,文化保守主义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却是十分可悲的。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

书讯: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全三册)

编著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精装 16 开,1900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出版,定价:¥1200.00 元,ISBN: 7-5013-2799-8/K·1201

本书选收清代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编撰的有关陶文、砖文、瓦当文的研究资料,共计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